

【性别研究】

女大学生村官的日常策略与性别再生产

王海宇 刘扬

【摘要】大学生村官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因其“局外人”身份在传统乡土社会中遭遇多种阻力,其中的女大学生村官还要面对额外的性别压力。通过民族志研究,本文展现了Z市女大学生村官如何将“女性符号”转化为日常生存策略中的“弱者的武器”以应对其自身所处的多重困境。具体策略包括(1)家庭角色公共化:清扫与看护;(2)性别“软策略”:撒娇与诉苦;(3)身体特质工具化:外在形象与生活习惯。但“弱者的武器”依然是女大学生村官对社会性别符号的顺应,并实现了后者的再生产。

【关键词】弱者的武器;女大学生村官;日常策略;性别再生产

【作者简介】王海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刘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助理编辑。

【原文出处】《清华社会学评论》(京),2021.第16辑.118~138

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暴力是通过纯粹的象征途径来实施的,这些象征途径不仅包括交流、认识,更确切地说,还包括不承认、承认甚至情感。

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2012:2)

一、国家制度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弱势精英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深刻动摇了乡村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结构(李培林,2004)。农村集体经济日渐式微(何路社,2012),公共服务缺失、留守家庭失范等社会问题频繁发生(刘燕舞,2013;朱海忠,2008;吴霓,2004),乡村衰败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制约了国家在基层的治理能力。乡村衰败呼唤乡村振兴,而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中的精英群体;打工经济所引发的劳动力大规模离乡,使得农村社会传统精英严重流失(吕洪良、吕书良,2009),那些具有一定文化资本的大学生村官顺势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

200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等四部门印发了《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试行)》,旨在储备、锻炼基层人才,同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鲜血液。这批大学生村官是乡土社会中的新精英,也是中国实现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王亚华、舒全峰,2018)。结合相关文献以及田野经验,笔者

发现,制度、文化、性别、家庭角色等因素使大学生村官,尤其是女大学生村官,在劳动过程与日常生活实践中处于“多重弱势”地位。具体表现为:国家制度外的游离者、传统乡土中的异乡人、乡村政治中的瓮中人、男权话语中的依附者以及家庭生活中的叛道者。

第一,国家制度外的游离者。大学生村官既不属于《公务员法》中的国家行政编制人员或事业编制人员,也不属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从本地选拔的“内生型干部”;再加上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关于大学生村官的具体政策存在诸多差异(钱德洲、刘祖云,2018),使得该群体处于制度设计的模糊地带。

第二,传统乡土中的异乡人。大学生村官到农村“熟人社会”面对的首要困境是适应并融入农村社会,一项对大学生村官的调查显示:有44%的受访者认为农村人际关系复杂、工作难以深入、水土不服、缺乏认同感;与之相比,仅有22%的受访者表达了对收入的担忧(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大学生“村官”课题组,2008)。

第三,乡村政治中的瓮中人。基层政治场域中的职业女性通常会面对“隐形天花板”(鞏雪妮,2009),能够进入村庄政治权力核心、掌握村庄优势

资源的女性目前仍是凤毛麟角(刘筱红、陈琼, 2005)。法律文本中模糊规定的“应有适当比例的女性干部”在实际政治实践中被选择性地忽视(杜洁, 2006)。

第四,男权话语中的依附者。在传统乡土社会,男性掌握权力并占据话语优势地位(陈锋, 2011);社会倾向于给予男性更多赞许、鼓励、机会和资源,而用传统的、狭隘的标准来要求女性(王会、郭俊霞, 2014)。由此导致的资源与话语权分配不均,使得女性在日常实践中只能策略性地选择去依附男性话语体系(巴拉巴诺娃, 2007)。

第五,家庭生活中的叛道者。女大学生村官需要扮演好“基层政治精英”的工作角色,同时还要扮演好“贤妻良母”的家庭角色(杨雪云, 2011)。在这样

的角色冲突中,那些选择将更多时间与精力投入工作中的女大学生村官,通常会受到来自家人以及身边人的误解,甚至引发家庭矛盾。

笔者在田野中发现了这样一批女大学生村官,她们在“劳动过程”与“日常实践”之中摆脱了上述“多重弱势”的不利境地,在农民合作组织化、乡村基建、产业升级、基础教育、文化宣传等一系列工作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具体成就详见表1)。

借此,本研究试图去回答:当我们将“性别符号”尤其是“女性符号”视为一种争取生存空间的工具时,这些女大学生村官如何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运用“女性符号”以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呢?这些具体的生存技术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表1 本研究所选取的8名女大学生村官

姓名	个人情况	所在村及其职务	所在村情况	个人工作成绩
ZHX	30岁;已婚已育;本科	YJ村;村党支部书记	常住48户90余人;耕地407亩;以杂果种植为主;山区;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	改造自来水管管道与混凝土蓄水池;建设3000米水泥路;成立非洲雁养殖合作社;在村小学代课
DHH	32岁;已婚已育;本科	NZ村;村党支部副书记	常住410余户1180余人;耕地930亩;城郊村;80%从事剪纸行业,占人均纯收入的68%	重修桥梁;硬化路面2500米;新增三口水井;推动政务改革:“四议、两公开、一监督”工作法
LCN	32岁;未婚;硕士	BW村;村支书助理	有省道通过;常住66户166人,贫困人口135人;以林地为主;特色作物杏扁和核桃;2015年人均收入2468元	修建9个垃圾池;做广播,丰富村民生活、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农业技术;流转土地100亩建立采摘园
LYH	33岁;已婚已育;本科	DX村;村党支部书记	下辖4个自然村,常住333户769人;耕地5357亩;Z市最大的蔬菜市场,年交易额过亿元	扩增800亩水浇地,引进新技术膜下滴灌;帮助菜农维权,打击“菜霸”;组织村民巡逻队
YCY	27岁;未婚;本科	CS村;村支书助理	常住172户538人;水浇地1000亩;贡米原产地;山地海棠旅游;2015年人均收入5120元	开办农家书屋;组织老年广场舞队;创立旅游服务社;举办三届海棠花节
ZY	29岁;已婚已育;本科	ES村;村党支部副书记	下辖6个自然村,1463人;耕地6400亩;节水农业,绿色蔬菜种植;2015年人均收入4750元	建立民情档案;为低收入群体办理失业证;种植培育射干、桔梗、油松苗木、新品葡萄
LF	30岁;已婚已育;本科	XG村;村党支部副书记	下辖6个自然村;常住115户251人;以山地、丘陵为主;以种植业、劳务输出和牛羊养殖为主;2015年人均纯收入3200元	路面硬化1700米;全村路灯覆盖;每年组织全村妇女免费体检;建立平欧果榛示范园,成立专业合作社
ZSJ	31岁;已婚已育;本科	HS村;村党支部书记	下辖7个自然村;常住526户1528人;粮食总产量387吨,蔬菜总产量4500吨,牛奶总产量3000吨,牲畜2100头;2014年人均纯收入4524元	取消前领导亲属的特权;修建文化广场及健身设施;成立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慰老助残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二、文献回顾：职业、性别与底层视角

本研究尝试去探索女大学生村官如何将“女性符号”运用于日常策略中以摆脱其“多重弱势”的处境。在传统的性别研究中，“性别符号”被视为一种社会权力的建构，其一方面导致了社会分工之中的性别不平等，另一方面通过社会化过程进行再生产(Scott, 1986; 波伏娃, 2004; 佟新, 2005)。在日常性别学习与实践的过程中，“男性符号”被普遍想象为应该是阳刚、富于攻击性和独立性、不感情用事、决策果断、重视事业的；而“女性符号”则应该是阴柔、容易感情用事、对他人有依赖性、需要安全感和重视家庭的工作(果敦, 1989)。

(一)大学生村官与女性工作者的双重身份

女大学生村官“大学生村官”与“女性工作者”的双重身份，为我们考察既往相关研究提供了线索。既往有关大学生村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共管理领域，较少对其中的女性进行单独分析；同时，有关女性工作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劳动社会学领域，一方面基于“性别不平等”的前提假设对女性工作者的工作状态进行描述与解释性研究，另一方面则开始关注女性工作者对“男性符号”的顺应，并将其视为一种女性工作者的主体性展现。具体包括了以下三个内容。

首先，既往对乡村干部的研究基本都将大学生村官视为一个整体，较少关注性别的差异性。关注的领域主要包括乡村治理、村民自治、公共服务、税费改革、新农村建设等(贺雪峰, 2018; 赵秀玲, 2018; 胡红霞、李达, 2019)。关注的议题有重建过程中乡村干部作为自组织能人的具体技术(罗家德等, 2013)、农村传统宗族共同体与国家正式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贺雪峰, 2000)、村庄内部的权力结构(全志辉, 2002)等。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大学生村官制度化进程快速推进，对这一群体的研究重点关注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相关制度的设计与执行、政策实施中的困境与解决之道(吕洪良、吕书良, 2009)以及大学生村官主体的身份认同与激励机制(栗振宇、彭熿, 2007; 郑庆杰,

2010)。还有研究以乡镇女性干部为对象，通过生命历程分析，关注其不同人生阶段所面临的个人困境与结构限制(廖旖旎等, 2017)。综合来看，即使已经有研究开始关注女性大学生村官，但主要以描述性研究为主，关注其群体特征、职业发展、实践困境以及意义远景等方面。

其次，既往劳动/工作社会学研究大都假定了女性在工作场域中的“弱势地位”，并尝试对性别不平等进行解释。其中的一部分研究关注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行业之间的性别隔离、薪资上的性别差距、女性晋升普遍面临的“玻璃天花板”、孕育禁忌等男女不平等现象(李春玲, 2009; 徐林清, 2004; 卿石松, 2011)。而另外一部分研究则尝试对这些不平等现象做出多元的解释。(1)性别社会化解释。其认为工作中的性别不平等来源于教育、技术、能力甚至气质上的差异，而这一差异是在社会化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宋月萍, 2007)。(2)人力资本解释。由于不同性别的员工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回报，所以企业在招募、升迁过程中，出于对经济理性的考虑更青睐男性(潘锦棠, 2003)。(3)组织内部性别建构解释。男性在工作中的强势地位来源于组织领导架构以及组织内部不同主体的实践互动，其优势地位的维持与再生产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赵慧军、王丹, 2006)。

最后，不少研究认为女性并不只是工作场域中性别符号的被动接受者，其也具有一定主体性，但主要是对“男性符号”的顺应。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范围内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作用不断显现(任颀、王峥, 2010; 肖薇、罗瑾琰, 2013)，阻碍女性晋升的“玻璃天花板”开始松动(胡志鹏、闫淑敏, 2014)。对职业女性成功案例的分析强调了“顺应性别符号”的重要性，即女性会在工作场域中采取顺应男性符号的一系列行动以实现工作目标。女性基层干部会通过淡化性别角色(李娇, 2010)、模仿男性化的工作风格(陈琼, 2005)、强化男性在工作中的主导地位(李秀颖, 2013)以保证其工作顺利开展。而女性白领则会通

过打造以男性为重要节点的社会网络(Ibarra, 1993)、在男性主导的工作环境中表现得恰如其分(Ross-Smith and Huppertz, 2010)、营造符合男性话语的企业文化(Ragins et al., 1998)等方式,以实现自身在职场中的成功。

(二)底层视角:“女性符号”作为日常策略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其底层研究中对“主体性视角”以及“日常反抗形式”的论述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与论证逻辑。其一,斯科特在对东南亚农民以及赞米亚(Zomia)山民的研究中,尝试从这些弱势群体的主体性视角出发,自下而上地用“弱者的武器”与“逃避统治的艺术”将那些过去不被重视的弱势底层群体置于研究中心。其二,他关注弱势、底层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精心策划”的生存策略,一如东南亚农民的“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斯科特,2011:2),又如赞米亚山民的“谋生手段、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甚至颇有争议的口头传承文化……”(斯科特,2016:2)。这些策略存在于“心照不宣”的日常生活之中,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依靠非正式网络运作。弱势群体借此避免了直接对抗权威所带来的风险,获得了有限的生存空间(郭于华,2002)。

在斯科特的研究思路的指导下,本研究尝试发掘女大学生村官在构建日常行动策略中对“女性符号”的策略性运用。女大学生村官这一具有“多种弱势”的乡村精英,作为国家制度外的游离者、传统乡土中的异乡人、乡村政治中的瓮中人、男权话语中的依附者以及家庭生活中的叛道者,必须去发展更多的日常策略以减少日常生活中的摩擦,并尽可能地实现工作目标。在日常策略的设计中,既往研究将“性别符号”视为一种对女性的结构限制,女性需要依附于“男性符号”以获取生存空间;而本研究则认为“性别符号”尤其是“女性符号”,即在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女性的阴柔与感性、女性的外貌特征以及生理习惯等,为女大学生村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依据“女性符号”所设计的日常策略,成为女大学生村官“弱者的武器”。

三、民族志与田野点介绍

(一)乡村振兴项目下的民族志研究

本研究采用民族志(ethnography)的研究方法,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具体技术,获取经验材料(格尔茨,1999);通过对经验材料的归纳,展现女大学生村官这一群体如何在“多重弱势”的场域中将“性别符号”尤其是“女性符号”作为一种“弱者的武器”以构建其日常策略。

TH大学与Z市合作推进的乡村振兴项目为笔者提供了进入田野的契机,2014年10月至2016年12月,由笔者团队参与的乡村振兴工作具体包括三项:(1)10期大学生村官创业培训,(2)培育“新农人”社会组织以及,(3)新农村整体规划设计。其中的前两项工作主要是以大学生村官为抓手,为大学生村官提供创业培训以及技术资金支持,培育其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笔者主要通过参与式观察与重点访谈搜集一手材料。首先,笔者团队多次往返于YH大学与Z市开展乡村振兴工作,通过日常办公会议、陪同村工作人员入户探访以及在日常饭桌上、闲谈中不经意的参与式观察获取材料。其次,笔者团队利用大学生村官集体在TH大学长期培训的时间,先后访谈了39名大学生村官,其中女性27名,主要关注女大学生村官进入乡村以及开展工作的整个过程,包括遇到的具体困难与应对方法。访谈材料的编号原则是“受访对象代码”加“受访时间”。

(二)田野点与研究对象简介

H省乡村是中国华北乡村的典型缩影(黄宗智,2000)。笔者主要的田野点Z市,位于北京的上风上水带,为保证首都的环境质量及用水安全,当地工业发展受到严格限制;同时,Z市干旱少雨,荒漠化严重,寒冷漫长的冬季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农业发展。借助坝上草原而兴盛的旅游业以及丰富的矿产资源目前是当地主要的经济支柱,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大量非农就业岗位。

2013年至2015年,Z市招聘的大学生村官数量呈现递减趋势,同时女大学生村官数量的下降速度更为明显。2013年Z市选聘大学生村官281名,其中

男性100名、女性181名(64.4%);2014年选聘大学生村官233名,男性97名、女性136名(58.4%);2015年选聘大学生村官125名,其中男性61名、女性64名(51.2%)。

本研究采取典型抽样法,选择来自H省Z市的8名女大学生村官进行深入研究。选择依据是(1)在村庄任职超过三年,基本融入了乡土社会;(2)在乡村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为取得工作成绩部分反映了女大学生村官日常策略的有效性。

表1中对这8位女大学生村官的介绍主要包括:(1)姓名、(2)个人情况(年龄、家庭结构、受教育水平)、(3)所在村及其职务、(4)所在村情况以及(5)个人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的成绩。

四、“弱者的武器”:女大学生村官的日常策略

男女有别的“性别符号”是“男性统治”的重要社会基础(布尔迪厄,2012:115),传统与父权制相关的“性别符号”具有褒扬男性价值、贬低女性价值的倾向,并通过社会化过程影响了每个人的日常实践(佟新,2005:17)。在社会化过程中,性别被赋予了一系列刻板印象:人们普遍认为“男性符号”应该是阳刚、富于攻击性和独立性、不感情用事、决策果断、重视事业的。在具体情境中,男性在表达客气时递上一支烟、在饭桌上推杯换盏、在任何场合随意穿着、在说话中夹杂着脏字等“男性符号”为行动者所默认。而“女性符号”则应该是阴柔、容易感情用事、对他人有依赖性、需要安全感和重视家庭的(果敦,1989:176)。

女大学生村官一方面会尝试顺应“男性符号”,另一方面策略性地将“女性符号”转化为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的重要技术,这不仅改变了其在乡村中“多重弱势”的不利地位,甚至为她们赢得了一些男性不具备的优势。借鉴斯科特的研究,笔者将女大学生村官这种与性别符号相关的日常策略概念化为“弱者的武器”,具体包括:(1)家庭角色公共化:清扫与看护;(2)性别“软策略”:撒娇与诉苦;(3)身体特质工具化:外在形象与生活习惯。

(一)家庭角色公共化:清扫与看护

对性别的角色期待被社会建构,并在社会化过

程中得以延续和再生产;女性在家庭中的工作包括操持家务、照料老人孩子等(佟新,2005:25),尤其是在乡土社会之中,这种观念更加根深蒂固(刘爱玉等,2015)。女大学生村官会主动将家庭角色带入工作之中,这样做既是被动处境之下的逆势而为,也是一种基于理性思考的策略性选择。

1. 清扫:逆势而为,润物无声

在工作中遭受冷遇的女大学生村官想要改善周围人对其的刻板印象,通过自愿、主动、持续性的整理、清扫办公室是最直接的选择。同时,若她们不主动或者拒绝完成这类工作,则会加深男性对其的偏见。

如果一个办公室有女人,那收拾卫生这种事情男的一般不会做……主动干点活儿肯定有好处,能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对办其他事情有好处。……没有人会去命令你(清扫)这些事,但如果你不干的话,还是会被别人挑理(挑毛病),人家会说你这个人太懒、不懂事儿。(LF20161123)

清扫过程为女大学生村官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工作场域。一方面,充满家庭女性色彩的工作可以为女大学生村官创造一个相对轻松、与同事非正式交流的环境;另一方面,女大学生村官可以利用清扫的时机,向男性同事或领导提出工作上的建议或要求,这种非正式场合中的诉求往往更容易实现。

我每天早上都会去书记、镇长的办公室去倒烟灰缸、扫地……时间长了之后我发现,我跟领导的关系好像比同一届的男村官还熟悉。……那时候的聊天是会站在一个过来人的立场,再不然就是以一种父亲或老大哥那样的长辈身份来给你一些建议。(DHH20150321)

我当时想流转村里的一块土地去种药材,就趁着收拾会议室的机会,先跟我们村书记聊了些闲事……后来他在这件事上帮了我很多。(ZY20161125)

2. 看护:触机而发,可遇不可求

还有一类临时性的、带有家庭分工色彩的工作——看护男性同事或领导的孩子。笔者在田野中发现,年轻、有文化的女大学生村官被村民认为是照顾儿童的最佳选择。女大学生村官通过教孩子写作

业、画画、唱歌,陪同孩子做游戏,给他们买零食等方式来“取悦”和“讨好”这些孩子,甚至会引导孩子如何应对家人之后的询问,以期在男性领导面前留下更好的印象。

有一次我们村书记家里有事,把小孙子送到了村委会,让我帮忙看一会儿孩子。……我没想到小孩子那么淘气,气得我几次想动手。不过当然不能打了。……后来我们书记还有他老婆都特别真诚地跟我道谢了,说孩子回家之后跟他们一直夸我来着……之后,我再遇到一些为难的事情,书记就会比较愿意出面帮我说话,我婶儿(村书记的妻子)也会经常叫我去家里吃饭。(ZSJ20141217)

与清扫不同,当工作环境中的男性领导或同事提出让女大学生村官帮忙照看孩子的时候,也就欠下了人情。获得帮助的男性同事会通过口头感谢,或者实际支持女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等行动来回馈她们。只是,这种突发的状况往往随机发生,可遇而不可求。

(二)性别“软策略”:撒娇与诉苦

本研究所访谈的女大学生村官,不仅顺利完成了其作为村官最基本的基层治理工作,同时还是乡村中创业致富的带头人,是乡村振兴的典范。这就意味着她们一方面要在工作过程中展现自己努力工作的“硬”的一面,比如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与汗水;另一方面还要结合“女性符号”去展示其“软”的一面,通过“软硬兼施”以争取日常工作的顺利开展。

1.“硬”的一面:时间、精力与汗水

引进非洲雁的项目……好不容易说服了4户村民入股,最后收钱的时候还都反悔了……于是我咬咬牙,跟亲戚朋友借钱自己干。自己先干出点名堂来,村民才能信我。(ZHX20141215)

禽类养殖的味道是非常大的……我去食堂吃饭,没有人愿意跟我坐一张桌子……我们村委的一个同事来,一个大男人,刚一进来就被刺鼻的臭味给熏吐了。他说他以前小瞧我了,也真的服我了。(ZHX20141215)

我刚开始想在荒山上种榛子树的时候,没有人看好我……每天早上上班之前、晚上下班之后,我顶

着星星月亮在山上干了两年,怀孕八个多月的时候我还去山上除草……县长知道了我的这些经历之后,直接竖起了大拇指……(LF20161123)

埋头苦干是一种“硬策略”,要想在工作中取得成功,女大学生村官还需要尝试去将“女性符号”转化为一种“软策略”。传统性别符号中对于女性软弱、依附、感性的定义,在女大学生村官日常策略中得到了运用,具体表现为撒娇与诉苦两个方面。

2.“软”的一面:撒娇,“女儿”身份的建构

女大学生村官进入村庄后,往往将自己塑造成“女儿”或“孙女”等晚辈的角色。通过这种方式,她们表达了自己作为女性的“依附”特征(刘爱玉等,2015);同时传递出自己柔弱、需要保护的信号,勾起别人同情与怜悯的感情,在初入乡土社会时便可以快速地为人所接纳,并与他人建立起类似家人般的关系。

男村官可以一边抽烟一边跟人家聊天……但我觉得我们比男村官更有亲和力。……村民们以留守老人居多,孩子常年不在身边……我陪他们聊天的时候常常会让他们就把我当成孩子。(DHH20150321)

而当女大学生村官在村庄中的工作开展遇到困难或当她们有诉求时,这一身份使她们得以用一种近乎家中晚辈向长辈撒娇的方式寻求男性的帮助。

我最常说的一句开场白就是,“您看,我一个小姑娘……”,这句话在农村真的还挺有用的,不管是你推辞饭桌上别人的敬酒,还是就布置的工作跟领导讨价还价,又或者是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想要请别人帮助,等等,一般你一个女孩子这么说了,别人都会给几分情面。(ZY20161125)

3.“软”的一面:诉苦,眼泪作为武器

在传统的性别观念里,泪水被认为与脆弱、感性等气质紧密相连,因而被建构成为一种高度女性化的符号(黄南珊,1991)。当在工作中遇到困难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女大学生村官往往会用诉苦和泪水来博取他人的同情。流泪的场景并不单一,除了求援时的泪水,还有完成工作后喜悦的泪水,以及得到帮助后感动的泪水等。这些泪水使得女大学生村官的

形象更加丰富而立体。当然,女大学生村官会有意识地去控制“眼泪作为武器”的使用频率,以便使其发挥最大效用。

见到上级领导的时候,我想着自己遇到的困难和受的委屈,真是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可能是被我的泪水和建设农村的决心打动了,我从建设局要到了砂土和水泥,一个企业愿意免费出车帮我们拉建材。……不过,我就哭过那么一回,眼泪越掉越不值钱。(ZSJ20141217)

(三)身体特质工具化:外在形象与生活习惯

“女性符号”不仅存在于上述社会分层、职业流动、日常互动之中,还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了女性身体的形塑(布尔迪厄,2012:5~27)。这些与女性身体相关的符号会被女大学生村官视为一种争取生存空间的工具,笔者将其分为两类:一是外在形象的身体形塑,如对衣着、化妆、身材等方面的形塑;二是生活习惯的身体形塑,如对饮食、作息、生理周期等方面的形塑。

1. 外在形象的工具化

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一个女人的外貌价值决定了其社会价值(徐敏、方瑾,2003);女性的外貌价值集物质性与情境性于一体,即身材、嘴唇、裸露一部分身体等物质性特征,在不同情境下女性会选用不同的表现策略(黄盈盈,2008)。在历史上,女性对外貌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使她们成为男性统治的附属,从缠足到束身(包括身体、发型、服饰、声音、皮肤等),都体现着男性统治的控制与塑造(鲍尔多,2009:3)。

外貌成为女大学生村官一个重要的身体特质工具化策略,以实现其工作的顺利开展:她们会通过在不同情境下有意地调整自己的穿着、配饰和妆容,来迎合男性的审美眼光,适时、恰当、得体地展示出自己女性的特质。

组织部培训大学生村官的时候说过……尤其是女孩子,不要花太多心思在穿着打扮上。我现在觉得这句话只说对了一部分。确实,我们下村的时候应该尽量朴素一点,这样可以拉近和村民的距离。但当你镇里和村里工作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自己

的仪表的,一个年轻小姑娘太不修边幅、土里土气了也不好。(LYH20141215)

需要出席应酬场合的时候,我一般会戴上隐形眼镜、化个淡妆,穿件显身材的衣服,再配条项链什么的。毕竟领导带我们去跟人应酬,我们就理所应当注意一下自己的仪态,不能让领导丢了面子。(YCY20161124)

但是外貌也会给女大学生村官带来一定风险。一方面,如果女大学生村官过于注重外貌,则可能被贴上“不接地气”“花瓶”或“绣花枕头”的标签,反而加深了男性对她们的性别刻板印象和对其能力的质疑;另一方面,外貌这一策略一旦被过度运用,则可能会招致流言蜚语,甚至会造成人们对女大学生村官个人品德的诟病。如何结合自身特质与工作情境来适度地使用“外貌”这一性别特质,成为女大学生村官日常生存中的重要技术。

我只要是下村,几乎从来都不穿裙子……农村是一个很容易产生闲话的地方……我们隔壁镇以前有一个女大学生村官,长得比较漂亮又好打扮,最后被传跟他们村的书记有一腿……(ZY20161125)

2. 生活习惯的工具化

喝酒是开展基层日常工作的一个重要形式(强舸,2019)。而在传统的性别符号以及与消费相关的性别符号中,女性被认为是不适宜饮酒或容易醉酒的(蒙艺、马遥,2021),这为女大学生村官在日常酒局中的应酬提供了回避饮酒的可能。在饭桌和酒局上,在需要饮酒的情境中,女大学生村官会把“女性符号”作为其不喝酒或者少喝酒的“挡箭牌”。

别人给你敬酒或者让你去敬酒的时候,一般不会在意你喝多少,“点到为止”就好。(LYH20150319)

每个月不舒服(例假)的几天,不能喝酒,这时候虽然不好意思说……但一般说了之后就没人再劝了。……有时候真不想喝酒的时候也可以拿这个(例假的借口)挡挡酒。(LF20150511)

……你总是推辞拒绝(喝酒)的话,那人家就会觉得你这个人不懂事了……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会稍微意思一下,也不能比别人差太远。(YCY20150430)

通过本部分田野材料的呈现,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符号”如何成为女大学生村官在日常生活中的“弱者的武器”。具体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女大学生村官将家庭分工中女性所扮演的“清扫与看护”角色延伸到了工作场域,实现了“家庭角色公共化”;第二,将既往性别符号体系中,女性作为弱者所具有的“撒娇、卖萌、诉苦、眼泪”等特质运用于工作场域之中,构成了日常工作“软硬兼施”策略中的“软策略”;第三,既往对女性外在形象与生活习惯的身体规训成为女大学生村官在工作场域中印象管理的策略,甚至为其规避了一些压力与风险。

五、结论与反思

(一)“弱者的武器”:女大学生村官日常策略中的“女性符号”

女性如何在工作场域中取得成功?既往的研究一方面在“性别符号是权力关系实现的重要维度”(Scott, 1986)假设之下,对女性工作者的工作状态进行描述或对其工作过程中的不平等进行解释;另一方面则关注女性在工作过程中对于“男性符号”的顺应,并将其视为一种女性工作者的主体性展现。通过对女大学生村官的民族志研究,笔者发现,身处“多重弱势”之中的女大学生村官,被迫发展出一套策略性运用“女性符号”的日常实践——“弱者的武器”,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规避潜在风险,以确保其在乡村中的工作顺利开展。

具体来说,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从主体性与底层视角去反思女大学生村官在日常生活与工作策略;第二,关注女大学生村官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策略性地运用“女性符号”,而非仅仅顺应“男性符号”;第三,“女性符号”的使用策略具体包括(1)家庭角色公共化:清扫与看护、(2)性别“软策略”:撒娇与诉苦、(3)身体特质工具化:外在形象与生活习惯。

由“女性符号”构成的“弱者的武器”包含着边界,女大学生村官既要有策略、恰当、适时地运用和表达自己的性别气质,又要小心翼翼,避免影响到乡土社会中“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吴毅,2007)。

进村之前很多人都给我打过预防针,家里的长

辈、组织部,还有镇里的领导都反复嘱咐在村里要注意安全。我自己也明白,自己一个女孩子,得既融入那个氛围,又不能太过度。(ZHXX20141215)

(二)延伸:家庭角色扮演失败与线上虚拟印象管理

女大学生村官实现“弱者的武器”的代价是其作为女儿、妻子、儿媳、母亲等家庭角色的不完整,有些人甚至放弃了全部家庭角色。一方面,由于工作地点与家的距离较远,女大学生村官只能选择住在工作地点附近,或者选择早出晚归。另一方面,女大学生村官不仅要承担日常行政工作,在乡村创业的女大学生村官甚至还要牺牲更多的私人时间。

说真心话,我真的很累很累。很多时候我自己也会怀疑,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做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到头来,事业劳心劳力没搞成,家里鸡飞狗跳一团糟。(DHH20150321)

女大学生村官能留给家庭的时间与精力十分有限,随之带来的是家庭成员的误解与家庭情感的缺失。家庭情感的缺失使得女大学生村官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下降,她们只能尽力通过“低姿态”“多包容”来狼狈应对家庭成员对其的抱怨与不解。

(对笔者说)你没成家不会懂的。女人跟男人不一样,在外面不管混得怎么风生水起,只要家里没照顾好,别人就会说你做女人的责任没尽到。(DHH20150321)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通信软件进入了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女大学生村官通过微信构建了一个女性的非正式支持网络,以弥补其真实世界中社会关系的匮乏与缺失,获得群体认同。

首先,通过朋友圈构建理想形象。通过分析4位女大学生村官60天中的朋友圈内容,笔者发现,她们发布在朋友圈中的内容主要可以分为:励志类、家庭生活类、工作专业类以及广告宣传类。通过鸡汤、晒娃儿、炫美食、秀工作等方式,她们在微信好友面前呈现了一个感恩生活、热爱工作、有着较高生活品质和生活情调的幸福女人的形象。

其次,通过微信群建立群体认同和归属感。女

大学生村官在闲暇时间活跃于各种微信群组,包括其创业产品的新老顾客群、妈妈群以及红包群等。女大学生村官会根据群主题的不同做出相应调整,在互动中建立信任与认同。这一方面使其获得了线上的情感支撑,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农产品的销售。

(三)性别再生产:强化男性统治的“女性符号”

当个体成功地学习并实践了性别差异,就同时维持、再生产并合法化了这些社会安排与权力结构(波伏娃,2004; West and Zimmerman, 1987:112-123)。正如上文所言,在“弱者的武器”的实践过程中,女大学生村官熟练地运用一系列“女性符号”——家庭分工中的清扫与看护,日常实践中女性的撒娇、卖萌、诉苦、眼泪,身体层面的外在形象与生活习惯来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规避潜在风险。但是她们忽略了自身自觉使用的“女性符号”事实上依旧是社会性别权力之下的产物,这些“女性符号”都是与男性统治符号相呼应的社会建构(布尔迪厄,2012)。也就是说,女大学生村官在实践中将“女性符号”作为“弱者的武器”的同时,也在事实上默许、内化并再生产了以男性为主导的性别秩序。

*本文得益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教授、郭于华教授的指导。感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王凡在本文写作成文过程中的大力支持,感谢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游睿山先生与“新农人”项目的田野支持。

参考文献:

- [1]巴拉巴诺娃, E.C., 2007,《女性经济依附性的实质原因及后果》,《国外社会科学》第5期,第108~110页。
- [2]鲍尔多, 苏珊, 2009,《不能承受之重: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 慕亮、赵育春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 [3]波伏娃, 西蒙娜·德, 2004,《第二性》, 陶铁柱译, 中国书籍出版社。
- [4]布尔迪厄, 皮埃尔, 2012,《男性统治》, 刘晖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5]陈锋, 2011,《依附性支配: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一种解释框架——基于辽东地区幸福村的实地调查》,《西北人

口》第1期,第83~87页。

[6]陈琼, 2005,《村庄治理中的女村官研究——以江西三个村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7]杜洁, 2006,《以研究促进政策和法律纳入社会性别视角——社会性别与法律/政策项目的探索》,《妇女研究论丛》第52期,第6~10页。

[8]格尔茨, 克利福德, 1999,《文化的解释》, 韩莉译, 译林出版社。

[9]郭于华, 2002,《“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读书》第7期,第11~18页。

[10]果敦, L. K., 1989,《性别社会学》, 程志民译, 重庆出版社。

[11]何路社, 2012,《农村人才外流弱化了农村政治治理》,《农村工作通讯》第5期,第37页。

[12]贺雪峰, 2000,《面子、利益与村庄的性质——村支书与村主任关系的一个解释框架》,《开放时代》第11期,第62~67页。

[13]贺雪峰, 2018,《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与性别问题》,《云南行政学院学报》第1期,第4页。

[14]胡红霞、李达, 2019,《近十年中国女大学生村官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第1期,第28~35页。

[15]胡志鹏、闫淑敏, 2014,《女性高管成长中的三重玻璃天花板及其突破路径》,《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第7期,第30~36页。

[16]黄南珊, 1991,《泪文学与情感表现》,《广西社会科学》第2期,第134~138页。

[17]黄盈盈, 2008,《身体·性·性感:对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8]黄宗智, 2000,《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中华书局。

[19]李春玲, 2009,《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江苏社会科学》第3期,第9~16页。

[20]李娇, 2010,《被“政治化”的女人和女人的“政治”之道》, 硕士学位论文, 云南大学。

[21]李培林, 2004,《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羊城村的故事》,《江苏社会科学》第1期,第1~10页。

[22]李秀颖, 2013,《村庄治理中的女村官研究:以湖州市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 浙江大学。

[23]栗振宇、彭熿, 2007,《大学生“村官”的“角色社会化”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9期,第50~54页。

[24]廖旖旎、聂建亮、王彩云, 2017,《个体生命历程视角下乡镇女干部职业生涯轨迹研究》,《青年研究》第2期,第47~55页。

- [25]刘爱玉、佟新、付伟,2015,《双薪家庭的家务性别分工:经济依赖、性别观念或情感表达》,《社会》第2期,第109~136页。
- [26]刘筱红、陈琼,2005,《村庄权力系统中女村官地位的类型分析——基于江西三个村的实证调查》,《妇女研究论丛》第1期,第19~22页。
- [27]刘燕舞,2013,《农村老年人自杀及其危机干预(1980-2009)》,《南方人口》第2期,第57~64页。
- [28]吕洪良、吕书良,2009,《新农村建设与大学生村官政策》,《中州学刊》第1期,第21~24页。
- [29]罗家德、孙瑜、谢朝霞、和珊珊,2013,《自组织运作过程中的能人现象》,《中国社会科学》第10期,第86~101页。
- [30]蒙艺、马遥,2021,《欲把关怀寄酒樽:当代中国城市青年女性饮酒行为实践研究》,《青年发展论坛》第2期,第56~65页。
- [31]鞏雪妮,2009,《我国妇女参政中“权力尖端缺损”现象的成因及对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
- [32]潘锦棠,2003,《性别人力资本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3期,第94~104页。
- [33]钱德洲、刘祖云,2018,《从“嵌入”到“融合”: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弱化与优化》,《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第107~113页。
- [34]强舸,2019,《制度环境与治理需要如何塑造中国官场的酒文化——基于县域官员饮酒行为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第4期,第170~192页。
- [35]卿石松,2011,《职位晋升中的性别歧视》,《管理世界》第11期,第28~38页。
- [36]任颀、王峥,2010,《女性参与高管团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第5期,第81~91页。
- [37]斯科特,詹姆斯,2011,《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译林出版社。
- [38]斯科特,詹姆斯,2016,《逃避统治的艺术》,王晓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39]宋月萍,2007,《职业流动中的性别差异:审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经济学》(季刊)第2期,第629~654页。
- [40]仝志辉,2002,《农民选举参与中的精英动员》,《社会学研究》第1期,第1~9页。
- [41]佟新,2005,《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
- [42]王会、郭俊霞,2014,《发达地区农村的社会分化与妇女地位》,《人文杂志》第7期,第116~119页。
- [43]王亚华、舒全峰,2018,《中国乡村干部的公共服务动机:定量测度与影响因素》,《新产经》第3期,第93~102页。
- [44]吴霓,2004,《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查报告》,《教育研究》第10期,第15~18页。
- [45]吴毅,2007,《“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的表达困境——对一起石场纠纷案例的分析》,《社会学研究》第5期,第21~45页。
- [46]肖薇、罗瑾琰,2013,《第二代性别偏见与女性领导力开发》,《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第9期,第96~99页。
- [47]徐林清,2004,《女性就业的行业——工资倾向与性别歧视》,《妇女研究论丛》第2期,第34~38页。
- [48]徐敏、方瑾,2003,《现代女性“才”“貌”之社会优势比较研究》,《社会》第5期,第12~15页。
- [49]杨雪云,2011,《“乡村干部利益群体”:理论溯源及其凸显出的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6期,第147~150页。
- [50]赵慧军、王丹,2006,《浅议职业女性玻璃天花板知觉及其效应》,《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第5期,第97~99页。
- [51]赵秀玲,2018,《如何破解党的领导“脚底松软”难题》,《人民论坛》第9期,第26~28页。
- [52]郑庆杰,2010,《飘移之间:大学生村官的身份建构与认同》,《青年研究》第5期,第45~54页。
- [53]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大学生“村官”课题组,2008,《2008年大学生村官发展研究报告(节选)》,《中国大学生就业》第10期,第31~33页。
- [54]朱海忠,2008,《制度背景下的农村留守妇女问题》,《西北人口》第1期,第85~89页。
- [55]Ibarra, Herminia. 1993. "Personal Networks of Women and Minorities in Management: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8(1): 56-87.
- [56]Ragins, Belle Rose, Bickley Townsend and Mary Mattis. 1998. "Gender Gap in the Executive Suite: CEOs and Female Executives Report on Breaking the Glass Ceiling."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12(1): 28-42.
- [57]Ross-Smith, Anne and Kate Huppertz. 2010. "Management, Women and Gender Capital." *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 17(5): 547-566.
- [58]Scott, J.W. 1986.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5): 1053-1075.
- [59]West, Candace and Don H. Zimmerman. 1987. "Doing Gender." *Gender & Society* 1(2): 125-151.